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民族性研究

韩书堂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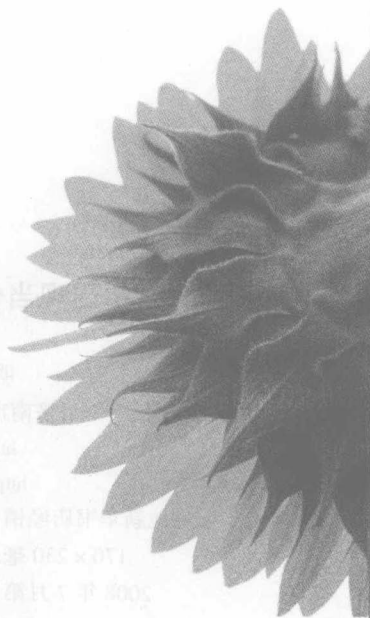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文学理论及其发展的民族性问题，即民族性在文学理论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历程，反思民族性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偏差与得失，探索民族性在未来的现代化文学理论建设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如何建设民族性的文学理论等。

明天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 文学理论民族性研究

ZHONGGUOXIANDANGDAI
WENXUELILUNMINZUXINGYANJIU

韩书堂 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民族性研究 / 韩书堂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332-5784-2

I. 中… II. 韩…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理论—民族性—
文学研究—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族性—文学
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099330 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民族性研究

韩书堂 著

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潍坊彩源国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170×230 毫米 16 开 29 印张 305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2-5784-2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一、问题的设定	2
二、文学理论“民族性”与“现代性”之关系	4
三、文学理论民族性研究的横向参照与理论要点	24
四、本书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38
上 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民族性的历史形态	43
第一章 中外融通与美善中和	
——文学理论民族性的作用力场与形态史观	44
第二章 改良维新与文学理论民族性话语的初始形态	49
第一节 “过渡时代”“新学”的困境	49
第二节 世界性价值观与中西会通之路	
——文学理论民族性话语初始形态	59
第三章 多元中和与文学理论民族性的成长形态	67
第一节 思想平台：传统与西学的均势存在	67
第二节 调和论与“学衡派”对中国文学理论	
现代化的哲学思辨	75
第三节 众声合唱——文学理论民族性的成长形态	95
第四章 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与文学理论民族性的汰变形态	120

第一节	民族矛盾和民族性问题的强化及其汰变	120
第二节	从有限“中和”到极端功利主义取向 ——民族性的汰变过程	127
第三节	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	153
第四节	“民族形式”——传统问题与民族性 的汰变形态	160
第五节	建国后关于“传统”的争论	178
第六节	从汰变到缺席——30至70年代末 “文艺理论民族性”问题鸟瞰	183
第五章	“现代化”、传统、全球视角与文学理论民族性的 重建形态	188
第一节	西化浪潮——现代化追求与文学理论 民族性的重建形态	189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民族性的重建形态	200
第三节	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全球性视角与文学 理论民族性重建形态	217
下 编	文学理论民族性的理论反思	231
第一章	文学民族性与文学理论民族性	232
第二章	文学理论民族性观念分析	237
第一节	什么是文学理论的民族性	238
第二节	民族性内涵与特色之一——经世致用	265
第三节	民族性内涵与特色之二——“中和”	275
第三章	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性的价值观	310
第一节	现代性观念	311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	320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民族性与现代性的 关系措置	325
第四章	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的空间性	334
第一节	中国文学理论对异质文学理论的接受模式	335
第二节	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两大原则	344
第三节	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措置	353
第五章	民族性与诸传统——民族性的时间性	373
第一节	传统与民族性概念的误用	373
第二节	传统的历史命运及其与民族性之关系	379
第三节	“民族性”与文学理论传统现代化	385
第六章	民族性文学理论建设的方法与机制——比较与误读	397
第一节	哲学比较：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与西方现 代理性的价值趋同性	398
第二节	诗学比较：对比较诗学的时代的和哲学的 阐释	412
第三节	比较方法与合理误读	418
第四节	弘扬民族性的障碍及其克服	426
第七章	结论——民族性与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的道路	430
主要参考文献		440
后 记		453

导论

导论的回顾



一、问题的设定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思考传统、反思传统,急切地要求对传统有一个新的、时代性的重新定位;而外来文化的冲击既是一种强大的外在压迫力量,又构成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文学理论的现代化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指导,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直处于不停的争论过程中,复古与西化,折中与调和,各自有人在提倡与实践。在争论与各种力量的相互对抗中,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走过了自己曲折的发展历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性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近代是这样,现代是这样,在经历了 17 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国家与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再一次接触到这一同样问题。80 年代经过短促的全盘西化运动,90 年代迅即进入一个文化传统反思阶段;90 年代末以来,全球化思想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再一次引起人们对传统、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探索和定位,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在文化的民族性平台上,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迅即进入文学理论建设的前沿。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文学理论及其发展的民族性问题,即民族性在文学理论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历程,反思民族性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偏差与得失,探索民族性在未来的现代化文学理论建设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如何建设民族性的文学理论等。围绕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这一

中心，我们要解决：文学理论民族性的定义，民族性与传统、与西方文学理论、与现代化和现代性、与世界性和全球化的关系，民族性如何促使传统记忆与域外文学理论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即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联合发挥作用？是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中西古今融会贯通的正确道路？在今天全球化意识日益强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学理论应该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理论保持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有历史材料和思想最新发展的共同佐证吗？为努力实现这种关系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观念意识作为保证？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一直处于不断争论中。近代由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人开辟了中西汇通的文学理论发展道路以来，从五四到现在，民族性与传统问题混淆起来，要么被批判，要么被颂扬，当然也有人从“调和”的角度立论，更有对民族性的严重误解和歪曲运用。一部分人把民族性问题与传统等同起来，从而以“传统”为观察问题的标尺，在探讨民族性问题时产生了复古与西化的对立、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等等，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道路开出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药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的种种歧见，都是因为没有把传统、现代化、中学、西学等方面纳入正确的“民族性”观念指导之下予以观察的结果。我们应该首先对于民族性有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在此一认识基础上，历史地反观上述诸问题，正确地处理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态度等问题。如此，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才能成为可能。这是全球化时代向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提出的挑战；中国文学理论要想真正在世界文学理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勇敢地迎接挑战。以与时俱进的现代化要求为最终价值追求，以“民族性”为动力，以发源于中国古老文化本体的“中和”观念作为我们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古今融合，中西汇通，

建设既有民族特色，又能与他者平等对话、交流并共同存在的国际文学理论新格局，应该是当代文艺学界努力的目标。本文算是一个粗浅的尝试。

二、文学理论“民族性”与“现代性”之关系

第一，“文学理论民族性”的问题性的形成。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不是一个原初性问题。历史地看，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与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文学理论的民族性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容、方法、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民族文学理论比较起来看，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征是明显的。但是，在近代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遭遇西方文学理论之前，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只能是事实地存在着，而不能进入意识形态视野和认识领域，不能被人们自觉地认识和研究。中华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生命力极强的文化族类。文学及其理论，作为一种上层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门类一起，经过长期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吸收了佛教文化的滋养，以儒、道、释的融合一体形态为基本特征，和政治、伦理紧密结合，构成了一个长期不变的超稳定结构。在近代以前，这种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文化，保证了中华文化旺盛的生命力，使之绵延持久，并能历久弥新。中华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艺理论，其天人合一观念、直观感悟式阅读方式和以诗话、词话为代表的理论形态，构成了灿烂丰富、浩如烟海的

文学理论历史文献。它有力地推动了以诗词曲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以及中国书法、绘画等艺术的发展。文学理论总是与文学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一方面以批评方式对文学创作作出有效的阐释，另一方面则以理论思考方式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同时，文学理论又与政治、经济等的发展密切相关，受到各个方面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但总体看来，中国文学理论在近代以前，独立发展，自给自足，其发展动力产生于内部，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尽管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受到佛教的巨大冲击，但是佛教的中国化使之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力量对中国文化构成革命性力量的可能性消失，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变革。佛教与道教，一起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的支撑力量，反而加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从积极的方面说，佛教的中国化显示了中国固有文化对外来文化的中和力量，中国固有文化总是向外来文化敞开，这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的秘密所在；它总是以强烈的实用理性，不惮于吸收域外文化于己有用之处，使之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此一点，可以说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对待域外文学理论的基本态度和策略。从消极的方面说，佛教的中国化也使中华文化失去了一个外在挑战力量，使自己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外在动力。现代文学理论史表明，有一个强大的外在力量处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身旁，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之下，中国文学理论既能吸引“外资”，在学习中综合创新；又能不断地回归传统，以此校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而朝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行进。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是一个文学发展和文学理论建设领域的“现代性事件”。首先它具有时代性，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产生于近代。在中国国门洞开之后，随着国家和民族危机产生了民族主义；相应地，在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民族性便日益成为问题。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之产

生,首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以后文学与文学理论得以比较与鉴别的国际关系、民族间关系。正如一个人只有在远离故乡时才能有浓浓的乡愁,一个人在长久告别自我的时候才会在偶然中蓦然怀念自己过去的身份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远离自己的原在形态和本色时,才有可能去思考自己的民族性。因而,民族性生成的前提必然是、首先是对传统的背离。当这种背离的距离达到一定程度,一种飘浮无根感就会油然而生,“我是谁?”“我何以是我?”“背离自我规定性的这个我还是真正的‘我’吗?”“未来的我如何、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这些问题构成了此时此地存在——“此在”的困惑。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走出了天朝大国的梦魇,意识到在外面的世界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势力,它压迫甚至要消灭中华民族,以华夏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以华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普世的天下主义让位于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以中西之辨为主要内容的救亡与图存,后者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存在的主题。其次,它又具有“现代化”实践基础,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对文学进行阐释的内在要求,也就是文学理论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文学变革的角度看,文学理论民族性的产生首先与文学的变革密切相关。在中国不得不直面外来文化和文学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文学自身发生了根本变革。在近代,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文学从以诗为主体的格局向以小说为主体的格局变化;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基本摆脱了古典形态,小说、话剧、小品文等发达起来,文学从观念、体裁、表现内容到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文学变革以西方文学流派的引入与介绍、学习和借鉴为契机,在有关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均发生了向西方形态的移动,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嬗变。因之固有的文学理论方式已不能适应文学发展的实际,不能对文学创作作出有效的说明和阐释,从而在文学理论层面也必然引入西方文学理论

的阐释方式和方法。近代以来国门开放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在与外来文学理论的冲突与融合中，其理论价值与地位受到挑战。人们必须对之作理性的重新认识和进行时代的选择。同时，对外来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与吸收也在同步进行。因而再次，所谓“现代性事件”也就是一个强调“主体间性”的事件。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传统与域外文学理论彼此认知、相互融合的过程，也就是民族性文学理论的生成过程。所谓民族性文学理论，并不等于传统文学理论，而是指形成于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相互融合、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实际的、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所以民族性文学理论是文学理论现代化的结果。随着民族意识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民族文化需要自我身份的强烈认同，需要作为一种文化主体重塑自己的独立性和合法性，文化领域以外国先进的文化体系为参照，开始了自己艰难的现代化进程。文学理论也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中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在域外文学理论的参照之下，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才得以成为一个问题进入人们的思考范围，才有了它的“问题性”。因此，民族性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构成空间中，在与他者的彼此对比、相互参照中产生的。民族性与传统扭结在一起，在西学的冲击以及人们对西学的取舍向背中，在现代化、世界化、民族化等复杂的价值导向下，在 20 世纪形成了奋发图强而又柔弱幼稚、目标明确而又困惑不堪的复杂形象。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融合的历史时代，是中华文化发生质变和学术范型转换的关键时期；它构成了我们文化的基本理解，左右着我们文化未来的道路选择与形态和内容的设定。这是由处于边缘的文化主体的复杂心态决定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的理性规定，故而在民族文化处于落后和边缘的时代，中国人总是能够自觉地把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作为自己的明确目标，而且总是能够对异质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

学习、融通的态度，总在进行着文化的中和工程。但是，这一过程的发生并不是平铺直叙、波澜不惊的，而是充满了民族情感的惆怅。这种情感发生于古今中西的文化较量与优胜劣汰的自然过程中，对域外文化的憧憬与向往、对民族传统的怀念与舍弃，反思、批判与接受和选择，构成了由现代化价值观和民族性情绪的共存而形成的张力状态，形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焦虑。这种焦虑的中心就是，从自我主体的角度来看，民族性作为自我的规定性是否受到了戕害？民族性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应该在文化的转移变革中实现同步变革？如何建设或固守民族性？进而，民族性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具有什么样的内容、朝什么方向发展？民族性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对西方文化的拒斥，总之，是“防御”的，还是以传统为阵地，对西方文化采取取而代之、消化之的战略举措？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思索及其实践，揭开了中国自近代以来文化现代化的序幕，决定了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模式。

对传统的思考也就促进了“民族性”问题的问题化。文学理论民族性问题的基元是传统，也就是说，民族性也以“传统”这一历史事实的承继及嬗变为根基。民族性问题在产生之后，就一直与传统、现代化等问题纠结在一起。如何开发传统资源，借鉴利用域外资源，厉行现代化，就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的主题，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文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和中轴线。其中，传统一直被视作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问题之根。“改良”、“反思”、“批判”、“回归”、“重建”……种种话语，种种态度，反映了人们对传统的复杂观感和情感意向。的确，从历史事实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在观念、形式上的全盘西化，文学的发展比之于其他文化门类的发展来，更加离不开传统、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内在继承，也离不开民族形式的与时俱进。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不断地总结和

利用传统的精神和形式，如鲁迅所谓白描手法，毛泽东所谓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等的基础上，全面学习西方文学，开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正因为文学的现代化不能没有传统的积淀，文学理论也自然不能离开传统文学理论的支持。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就是在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不断吸收和对传统文学理论的不断考古式发掘的合力中发展的，是在古典传统、现代传统和西方传统（在接受过程中往往把西方不同时期的文学理论平面化、空间化）的共同作用之中发展的。只有在这种多重合力的作用之下，中国文学理论才能真正建设起现代化的形态，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才能在世界文学理论格局中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只有这样，中国文学理论与其他民族文学理论相比较，才有自己的特殊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这样，在域外文学理论、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现实各个领域的共同观照之下，在传统、现代性（化）、世界性（化）的综合张力中，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渐次凸显，成为一个自近代以来即已开始的跨世纪问题。经过近代以“改良”和“维新”为中心话语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痛苦激变，经过五四时期对传统与西学的双重检视与扬弃，经过三四十年代在民族矛盾支配之下产生的对民族性与传统的极度张扬，至20世纪末的改革与开放，异文化的空前碰撞与融合导致了人们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理论自主性、独特性的焦虑，对中国文化或文学理论的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积极探索，诸如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包括古典文学理论）、域外文学理论之关系，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文学理论，甚至于如何建设现代化的文艺学学科，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全球化甚嚣尘上的今天，遂成为时代的显学。全球化理论对我们形成的压迫感和失去自我感，文学理论失语症所表现出来的学理和情绪上的焦虑，古典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努力及其保

守性和现代性，对古典传统、近现代传统和新时期以来的最新传统的发掘、反思与利用，这些都是中国文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努力的诸种尝试。其中心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性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使之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共存共荣，展开对话与交流。对话与交流既是建设的方法，也是建设的目标。一种平等的、民主的世界文学理论格局就是我们今天的追求。全球性或世界性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间相互关系的归纳性描述，而具体到一种文学理论而言，则建设民族性的文学理论应是当务之急。没有自我、没有个体性和主体性的文学理论，由于缺乏存在的合法性，不可能与他者文学理论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这就是我们今天回过头去探索文学理论民族性的动机。

第二，从文学理论民族性产生的思想背景上看，民族性与民族主义思想有密切关系。中国的民族危机或民族文化身份危机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一拍即合，民族性也就具备了问题性和解决的时代迫切性。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民族主义思想也是“西方”的，是“他者”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主要特色或说主要倾向是“天下主义”，而没有“民族主义”，讲究的是文化间的共同存在与相互融合。民族主义首先是一个西方事件，但是，当中华民族面对民族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危机，西方的民族主义就成为重建自我身份特征的思想武器和逻辑根据，西方的东西反过来又成为成就自我身份的重要力量，正如今天后殖民主义作为西方理论的权威话语，到了中国又翻转成为我们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学理论失语症的理论支撑。^①

注释

①不仅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存在着时空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在内容上也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不同。欧洲的民族处于漫长的、原始的发展状态，而民族国家则出现在近代化前后；民族国家的出现与民族主义理论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其时人们对各民族之特性的关注和研究就是一种明显的表现。而据

民族主义对于西方也不是一个原初性问题，它们是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扩张、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进展和近代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系列问题同步发生的。^②从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容实质及其所发生的历史效果看，

注释

吕思勉考证，中华民族早于五千年前即已形成。汉族“为最初组织中国国家之民族。其语言、习俗、文化等，皆自成一统，一线相承。凡世所称为中国民族者，皆以其能用此种语言，具有此等习俗文化而言之也。此族初居黄河流域，渐向长江、粤江两流域发展。其开化之年代，今尚不能确知。据史家所推算者计之，则其有史时期，当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并没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尽管在各民族间矛盾激化、政权斗争异常激烈的宋金、明清之际，文天祥、岳飞、侯方域、顾炎武等人的所谓民族意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也并未超出华夷之辨的古老范畴，也属于“天下”观念内部的东西，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是以民族间、进而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为标志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与理论，是在中华民族、中国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中出现的。简言之，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很早就有，但其民族主义意识则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在近代以前，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性的体认是不自觉的，甚至没有民族性这一问题存在于人们的文化意识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自觉的民族意识是在中西文化、政治关系紧张的大动荡历史中产生并形成和得以不断强化的，并不是像西方那样是由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外扩张的需要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②近代民族有的是在封建时代的民族基础上分化而形成的新民族，大多数则由旧民族转化而成，正如斯大林所说，资产阶级民族“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0~301页）。如西欧的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之后而形成近代民族的。近代民族不同于以前诸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民族的经济市场和经济中心，资产阶级是这种民族经济市场的主角，因此，近代民族的形成是同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并参与世界市场的角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化以前，欧洲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欧洲文化是从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融合中衍生出来的，全欧范围内保持着基本的同一性，只是存在着地域上的而不是民族性的南方与北方、文明与野蛮的差别而已。（参阅斯达尔夫人：